

教育对外开放视角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策略研究

——以东南亚为例

柴金萍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教育对外开放成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已升级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本文以东南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中文教育从殖民时期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历程,剖析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因政策环境差异形成的多元发展模式。结合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要求,从政策对接与合作模式创新、社会认知与需求变化两个核心维度,探讨国际中文教育在东南亚的发展机制与实践挑战。研究发现,东南亚中文教育呈现多样性、层次性与动态性特征,当前正面临从“规模化”向“高质量、内涵式”转型的核心任务,存在本土化教材与高水平师资短缺、教学效果不均等深层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秉持“差异化、精细化、协同化”原则,通过定制化方案、数字化赋能与质量评估体系建设,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区域政策、产业需求及文化语境深度融合,构建官方与民间、中方与本土力量协同共生的发展新格局,为跨境教育共同体建设与区域民心相通提供支撑。

关键词:教育对外开放;国际中文教育;东南亚;语言政策;跨文化传播

一、教育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背景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从最初的合作交流层面,升华为一项深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教育对外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提质增效与内涵发展的核心目标^[1]。其内涵已超越传统的人员流动与项目合作,延伸至教育理念、标准、资源与治理模式的深度互鉴与协同创新。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教学服务,更成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与重要实践载体。

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国际中文教育经历了规模迅速扩张的黄金时期,逐步建立起覆盖广泛、形式多样的全球教学网络。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和全球语言教育竞争的加剧,国际中文教育也步入转型与深化的新阶段,面临着一系列时代性挑战。其一,从“规模化”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压力日益凸显,教学效果、可持续性 & 本土适应性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其二,全球语境下,中文教育时常被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所裹挟,其文化传播功能与学术独立

性需在更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寻求平衡。其三,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浪潮对教学模式、资源形态与教师能力提出了革命性要求^[2]。这些挑战亟需在新的战略视野下,通过系统性研究与实践创新予以回应。

二、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东南亚的中文教育源远流长,其发展轨迹深受地区政治变迁、华人移民史及国际关系演变的多重影响。总体而言,其历程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殖民时期至二战前(19世纪末-1940年代):以华人社团自发兴办的“私塾”、“学堂”和“华文学校”为主体,旨在传承语言文化,维系族群认同。此阶段教育具有鲜明的社群内部性和文化传承性。

二战后至冷战时期(1950年代-1970年代):受民族国家建构与意识形态对立影响,东南亚多国对华文教育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甚至取缔政策(如印尼、缅甸、越南)。华校大量关闭或改制,中文教育转入地下或仅在少数地区艰难存续。马来西亚因其独特的多元社会结构,保持了相对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华文小学、独立中学),成为区域特例^[3]。

改革开放与关系正常化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中文的经济实用价值开始凸显。泰国、菲律宾等国逐步放宽限制,民间中文补习班兴起。新加坡则推行“双语政策”,将华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21 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与多元化时期（2000 年至今）：在中国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全球“中文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东南亚各国政府普遍将中文教育视为重要的外语选项加以推动。孔子学院 / 课堂的设立、政府间的教育合作协议以及数字经济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共同催生了中文教育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从华人社群向主流社会扩展的新格局。

东南亚中文教育的地域特点表现为：历史积淀深厚但断续性明显；发展水平与模式受所在国对华关系、华人人口比例及国家语言政策影响巨大；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的中文教育需求与目标存在差异^[4]。

各国政策环境的差异直接塑造了其中文教育的独特面貌：

泰国：政策最为积极开放。2005 年将中文列为第一外语，2010 年推出《促进汉语教学五年战略计划》，系统推动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广是其显著特征。

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从全面禁止（1966-1999 年）到逐步解禁并积极支持的过程。1999 年后，华文教育政策逐步放宽，2004 年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外语选修课程。其特点是在融合中复兴，注重将中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框架。

越南：政策兼具实用性与战略性。在传统汉喃文化影响基础上，随着中越经贸关系深化，中文成为热门外语。其发展受双边关系波动影响较大，政策时紧时松，但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完整、最体系化的华文教育系统（从华文小学到独立中学，部分大专院校）。其政策特点是官方承认华文小学地位，但对华文中学的拨款与学历认可长期存在争议，形成政府国民教育体系与民间华文教育体系并存的独特“双轨制”^[5]。

三、政策对接与合作模式创新

教育对外开放的首要体现，在于国家间教育政策的战略性对接与合作模式的系统性创新，这为东南亚中文教育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教育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语言互通明确列为“五通”中“民心相通”的基础支撑。在这一框架下，一系列定向的教育合作项目应运而生，对东南亚中文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催化作用^[6]。例如，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的“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及后续升级计划，大幅增加了东南亚学生来华留学及中国学生赴东南亚学习对方语

言的人数，创造了双向需求。同时，诸如“一带一路”奖学金、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等，为东南亚青年学子学习中文、来华深造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支持。这些国家级项目不仅输送了生源，更向东南亚各国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提升了中文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战略价值，鼓励当地政府与企业加大对中文教育的投入。

（二）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支持作用

比多边框架更具针对性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签署的一系列双边教育合作协议、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以及具体的语言教学合作备忘录。例如，中泰两国政府间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的协定，扫清了泰国学生凭中文成绩申请中国高校的制度障碍；中国与印尼教育部定期召开教育联委会，将中文教师培训、教材编写纳入合作议程^[7]。这些协议将中文教育从民间、学校的自发行为，提升至政府间合作的层面，为其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合作模式也从早期的中方单向派出和援建，逐渐向“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合管理委员会模式过渡，增强了项目的属地化管理与可持续性^[8]。

四、中文教育的社会认知与需求变化

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全方位人员往来（留学生、商务人士、游客）和文化活动（艺术节、电影展、青年营），使东南亚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从单一、抽象变得多元、具体。中文不再仅仅与遥远的“古老文明”或刻板的意识形态标签相关联，而是与具体的商业机会、科技产品、流行文化和就业前景紧密联系^[9]。这种认知转变，催生了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以实用为导向的中文学习需求。企业招聘将中文能力作为加分项，家长为孩子选择中文课程以期赢得未来竞争力。这种市场需求成为推动中文教育在体制内外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也促使教育提供方更加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职业导向^[10]。

然而，资源与人员的密集流动也必然伴随文化差异的碰撞。例如，中方教师直接移植的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纪律的教学方式，可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更强调学生自主、轻松活泼的课堂文化产生摩擦；一些中国文化推广活动若未能充分考虑当地宗教习俗或历史记忆，可能引发微妙的抵触情绪^[11]。这些冲突案例是开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调试成本”。成功的项目（如某些孔子学院）通过主动的本土化策略得以化解：聘请当地人士担任关键管理岗位，将中国文化活动与当地传统节日相结合，在教材中加入本地风土人情内容。这个过程，正是中文教育从“外来移植”向“本地共生”深刻转型的

缩影，也是教育对外开放理念从“单向供给”走向“双向适应”的实践体现。

五、总结

第一，在教育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定位已从传统的语言文化传播项目，升格为服务于人文交流、经贸合作与区域治理的战略性公共产品。其在东南亚的发展，不仅是语言教学行为，更是深度参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民心相通、构建跨境教育共同体的关键实践。

第二，东南亚中文教育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层次性与动态性特征。各国因历史脉络、政策环境与社会需求不同，形成了政府主导普及型（如泰国）、市场驱动实用型（如越南）、社群传承文化型（如马来西亚、印尼华人社会）等多元模式并存且相互影响的复杂生态。当前发展在规模上取得显著成就，但普遍面临从“量”到“质”转型的核心挑战，具体表现为本土化教材与高水平师资短缺、教学效果不均、不同教育体系间衔接不畅等深层问题。

第三，教育对外开放对东南亚中文教育的影响是一个多层次的机制化过程。它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对接与

项目合作提供顶层牵引，通过师资、课程、技术等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与共享实现能力赋能，最终通过广泛深入的文化互动与社会认知调适，影响中文教育的接受度与可持续发展根基。这一过程揭示了开放合作中“战略引领-资源赋能-社会融入”的递进逻辑。

第四，面向未来的策略优化，必须秉持“差异化、精细化、协同化”原则。策略应超越“一刀切”的推广模式，转向与各国教育政策、产业需求及文化语境深度嵌套的定制化方案，并高度重视数字化赋能与质量评估体系的建设，推动形成官方与民间、中方与本土力量协同共生的新格局。

展望未来，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根本性重塑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资源形态与师生关系。同时，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如东盟共同体）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中文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区域性的劳动力流动与跨境职业资格互认。在全球语言教育竞争加剧的态势下，国际中文教育如何构建兼具吸引力、竞争力和亲和力的独特价值叙事。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探索，将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走向深化与成熟。

参考文献：

- [1] 尹昌伟.“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研究——以东南亚为例[C]//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2024教育教学创新发展交流会论文集.普洱学院,2024:31-32.
- [2] 谢庚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南亚“互联网+”国际中文教育模式的构建[J].海南开放大学学报,2023,24(02):70-77.
- [3] 王卓群,林新年.“一带一路”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专业设置刍议——以东南亚地区本科阶段华文教育类课程为例[J].国际公关,2025,(10):158-160.
- [4] 宋晨铭.东南亚高校国际中文教师师资队伍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D].渤海大学,2024.
- [5] 秦岭.“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探究与实践——以西安文理学院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为例

[J].唐都学刊,2024,40(02):62-68.

[6] 侯露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中文师资供给优化策略研究[D].西安石油大学,2023.

[7] 曾晨刚,曾小燕,吴荷婷.商务中文人才需求:以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合作为例[J].全球中文发展研究,2025,(01):163-183.

[8] 尤思博.国际中文教育中中华文化的有效应用——以东南亚留学生为例[J].汉字文化,2023,(20):74-76.

[9] 李燕.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及认同研究[J].语言规划学研究,2023,(01):77-84.

[10] 郭旭.“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文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2020.

[11] 汤坤,马洪海.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海外中文教师本土化问题与对策[J].国际中文教育研究,2023,(01):45-63.